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京師 文化評論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 高全喜 从“早期现代”重审“现代性问题”：以格劳秀斯为例
- 刘清平 文化的主体性：谁在焦虑？如何认同？怎样自信？
- 张曙光 城市的气息何以使人自由？
- 晏 辉 伦理辩护与批判：城市化及其伦理后果
- 沈庆利 作为“方法”的“北京学”
- 程广云 诗人死了？！——当代中国诗人之死
- 名家圆桌 雷颐 孙郁 李景林 韩水法

2017  
秋季号  
总第一期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京市  
文化評論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2017  
秋季号  
总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师文化评论·2017·秋季号：总第一期 / 沈湘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203-0694-2

I. ①京… II. ①沈… III. ①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369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发 刊 词

春华秋实，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在这北京最美的季节，《京师文化评论》终于问世了。

100 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那是中国在列强持续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背景下不断确认自己落后之后的觉醒，她以批判传统的姿态载入了史册。100 年后的今天，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在神州大地涌动，这是中国和平崛起、被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时的抉择，她努力展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

文脉牵着国脉，文运连着国运，文化及其发展标识着一个民族最内在、最深厚、最根本的历史轨迹。几千年的人文中国经历了近代的阵痛、共和国初期的艰辛探索和近 40 年改革开放的激荡。冲突与选择、认同与批判、积淀与消弭、传承与创新，在后浪推前浪的文化热中，我们始终在勘定方位和方向，探寻新的文化、文明之路。全球化及所谓后现代的到来，使得文化更趋差异多样、物化和碎片化，虚无主义的焦虑与文化的繁盛如影随形。

真正的文化自信必然基于深刻的文化自省，真正的文化创新必不悖于自觉的文化救赎，真正的自省、自信与创新、救赎都离不开理性的反思。古今中西，天地人神，思想所在，斯文所在！

《京师文化评论》之创办，旨在呼唤同道、荟萃佳作、交流思想，以文字记录我们思考文化的努力。

《京师文化评论》立志放眼世界和中国文化发展大格局，突出“文化以价值为核心”“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文化基础理论，梳理历史文化脉络，观察现实文化走向，分析文化发展对策，力图开掘文化的思想资源，拓展文化发展的可能空间。

《京师文化评论》坚持以思想性立刊，举凡文化方面的新锐洞见，不拘形式，一律欢迎。既欢迎功底深厚的鸿篇大论，也欢迎短小精悍的思想随笔。

道阻且长，《京师文化评论》已经蹒跚起步；嘤嘤其鸣，她的声音还很微弱，但分明透着几分坚定：

道之所存吾往矣，岁在丁酉之秋！

2017 年 9 月

# 目 录

发刊词 ..... ( 1 )

## 特稿

从“早期现代”重审“现代性问题”:以格劳秀斯为例 ..... 高全喜 ( 1 )  
文化的主体性:谁在焦虑?如何认同?怎样自信? ..... 刘清平 ( 17 )

## 名家圆桌:文化的焦虑与认同

传统的发明 ..... 雷 颀 ( 39 )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百年知识分子的“正反合”之路 ..... 孙 郁 ( 45 )  
文化焦虑浅议 ..... 李景林 ( 50 )  
社会焦虑与最低共识 ..... 韩水法 ( 54 )

## 专题:都市与乡愁

城市的气息何以使人自由? ..... 张曙光 ( 63 )  
伦理辩护与批判:城市化及其伦理后果 ..... 晏 辉 ( 76 )  
乡愁的过去与现在 ..... 沈湘平 ( 86 )  
文化乡愁带给我们的哲学思考 ..... 邹广文 ( 92 )

## 前沿思考

中国文化自信的困局与出路 ..... 焦佩峰 ( 99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维与中国智慧 ..... 魏丽娜 傅守祥 ( 108 )

## 专题:作为方法的城市

作为“方法”的“北京学” ..... 沈庆利 ( 113 )  
上海城市的更新与城市记忆 ..... 包亚明 ( 123 )  
分期·层级·历史变动:西安城市史研究中几个问题 ..... 王 旭 ( 131 )

## 人文观察

诗人死了?!

——当代中国诗人之死 ..... 程广云 ( 145 )

---

中国传统死刑文化多维检视	张杰 (177)
<b>专题：新文化运动百年</b>	
实绩与缺憾：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回首	王学斌 (188)
鲁迅人生命运的轨迹	丁启阵 (194)
<b>记忆与叙事</b>	
村子里的暴力	杨志 (200)
柏格理与他的“石门坎”	施展 (209)
民国良友图书公司的时尚文艺画报	宋媛 (214)
<b>海外飞鸿</b>	
真正的革命？ ——专访迈克尔·朱克曼教授	邢承吉等 (220)
<b>影视书评</b>	
《红高粱》：戏与魅 ——后革命时代的国族言说	谭江华 (232)
好人与好社会：中国剧坛对《四川好人》的改编	贾力荔 (235)
稿 约	(240)

## Contents

Rethink “Modernity” from the “Early Modern Age”: take Hugo Grotius as an example .....	Gao Quanxi ( 1 )
Cultural subjectivity: Who are worrying? How do we identify with our culture?	
How do we build our self – Confidence? .....	Liu Qingping ( 17 )
The invention of the tradition .....	Lei Yi ( 39 )
Why does urban air make you free? .....	Zhang Shuguang ( 63 )
Ethical defense and criticizing: urbanization 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	Yan Hui ( 76 )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nostalgia .....	Shen Xiangping ( 86 )
“Beijing Studies ”, a kind of “methodology” .....	Shen Qingli ( 113 )
Are the poets dead?! – The death of poet in contemporary China .....	Cheng Guangyun ( 145 )
A Multi – dimensional research of Chinese culture of the death penalty .....	Zhang Jie ( 177 )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review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	Wang Xuebin ( 188 )
A Real revolu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ichael Zuckerman .....	Xing Chengji ( 220 )

## 从“早期现代”重审“现代性问题”:以格劳秀斯为例

高全喜\*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欧洲“早期现代”之状况,特别是古典法学家格劳秀斯及其传统,重新思考并审视了当今东西方思想理论界喧嚷一时的“现代性问题”,力图超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片面性和现代中国性的片面性,寻求关于中国现代性之“活的思想”,发现真正富有教益的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关键词:**早期现代 现代性问题 格劳秀斯

### 一

现代性问题是当今社会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通行的理论来说,关于现代性问题有诸多的论述,如果不追溯其枝节,在我看来,现代性问题大致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第一,从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性过程来说,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这个阶段大致经历了数百年,直到今天依然也还没有完成,这是从一个历史的维度上来审视现代性问题。

第二,从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来看,现代性问题又包含着所谓中西之争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的历史相关性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分享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现代性所具有的诸多冲突与融汇的问题。这个层面的问题也同样是进行了数百年,在今天也还是没有完成。

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性问题中所呈现的古今中西两个维度上的问题。在这两个维度上,我们又看到折射出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内在的文明价值的问题。这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现代性问题本身,超越了它所内涵的古典与现代之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别,而直接呈现出“人之为人”的现实存在之本性问题。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他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所当下存在的形态及其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本身

\*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就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永恒问题，它不但向西方人或东方人展示出来，它在古典时期甚至在未来也会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民族展示出来。所以它是一个真实而活生生的问题。

总之，从上述三个层面，即历史过程、文明形态和生存境况来看，当今学术界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基本上是在这三个框架内而展示出来的，尽管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思想的问题被不同的思想流派以风格各异的语言表现在不同的学科中，但是在我看来，有关现代性问题基本上是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本文的宗旨并不在于探讨现代性问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关于格劳秀斯的研究与现代性问题并不相干。但是，作为当今的一个中国学者，为什么要关注格劳秀斯这样一个四百多年前的古典思想家，挖掘他的法权国家与世界的思想，这对我来说确实又与当今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有关。当然，关于现代性问题，我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十分认同的。我在一本小册子《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中曾经对现代性问题本身提出过质疑，探讨过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左右两个版本，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激进性的思想偏差，以及处理了以英美思想为底色的祛除现代性观念的一种基本形态。不过在那本小册子里，我并没有具体展开有关现代性的另外一种叙述，即欧洲近世以来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叙事，也就是说，在质疑极端的激进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和极端的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性观念这两极之间，我只是探讨了一个较为中庸的英美经验主义的普通法其中与现代性问题不同的路径，而并没有探讨欧洲大陆自由主义思想路径中的现代性问题。

其实，这一种介于左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在欧洲也是源远流长的，从英国的霍布斯、法国的卢梭到德国的黑格尔，乃至当今的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也都有过非常卓越的论述。因此，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是当今思想谱系中的左中右三个路径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我那本小册子只是为了批判左右两个极端的现代性思考在中国所带来的喧嚣，而较为片面地立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并没有对现代性问题本身做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因此它只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今天，即便是要对现代性问题做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分析，那么我书稿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也仍然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尽管承认，在现代性问题上，源于自由主义的建设性的思想路径，确实存在着一种现代性问题，而且可以说恰恰是这个问题催生了自由主义的产生，例如像最具有原创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霍布斯，甚至马基雅维利，以及下面我要论述的格劳秀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等17世纪前后的思想家们，他们都是面临着那个时代的现代性问题而构建他们的思想理论的。这样一种先于成熟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自由主义之源流的思想家们，他们确实是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而且这种现代性问题在18、19世纪贯穿下来，直到当今，这个现代性问题的焦虑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正像哈贝马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所指出的，现代性还是一个过程，甚至这种现代性在当今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又以反现代和后现代的形式屡屡出现。

## 二

尽管如此，我的一个思想观点仍然还没有变化，那就是这里应该适当的区分现代与现代性问题的分野。或者说，现代性问题从一开始直到当今，就与现代化问题既密切相关，又有重大的区别。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区分呢？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层面是理论本身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现实的语境。

先说第一个层面，关于理论本身的思考。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乃是 20 世纪下半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思想命题。这个命题它所基于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有限的人性论和历史论的逻辑。也就是说，作为左右乃至自由主义的当代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之所以一致地认同现代性问题，其中虽然他们的理论观点有重大的不同，但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人类在当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是历史的演变的这个时间逻辑还是人性中的本体性逻辑，在当今这个时代都已经把它所包含的内容使用殆尽了。人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成为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最攸关的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末世论，是这个问题的基本内涵。无论是现代性问题中的虚无主义、复古主义还是乌托邦主义，其本身都是基于人的自我否定性，人与世界、人与人本身的隔绝与自毁相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以这样一个逻辑基础来审视人类历史，尤其是审视有别于古典时期的现代人类历史。从而揭示出一个现代人与古典人之本质区别的现代性问题。

应该指出，这样的一种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本身不在古典，也不在古典与现代之别，甚至不在现代性发轫之际，而在已经面向终结的人类当今时代。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很难说这个以当今时代的人类文明，以及以当今的人为尺度所昭示出来的这样一个五百年的现代性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经过现代性叙事所勾勒出来的现代历史以及当前的世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真实状况，人用现代性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的现代景观。它告诉给人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依然没有解决。当然，我们不否认，当今世界完全不同于古典时代，甚至早期现代，而且这个当今时代充满了诸种数不尽的罪恶，但是这个世界果真就像现代性问题思想家们所揭示的那样？至少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给出一个整合性的论述。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作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或者我把它称之为现代性的中国问题，面临一种更深入的困惑。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就西方的语境来说还有其产生的必然，并且包含着西方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丰富性的话，那么，现代性的中国问题，如果把这套富有内容的理论直接地移植过来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重大的困惑，那就是现代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晚近以来的事情。中国的文明传承有自，可以说在 1840 年以前一直都是一个古典的王朝专制社会，具有一种古典的社会形态，而现代性问题发轫于西方，早在 15 世纪就开始了，已经有了五百年的历史，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内容，其所成就的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甚至由于世界经济与经贸的广泛交往而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在西方演绎出了非常繁复多变的内容，因此，现代性问题对于西方思想来说，

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在理论和逻辑的层面上有一个完全自洽的结论，但其问题的提出及其扩展性的影响，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过五百年积累的西方思想在21世纪有此一变，它们由此对人类文明，对人的存在本身，发出警示性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甚至其悲观主义的底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文明或者说由西方文明所表征的人类文明，在当今确实处在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千年之变的结果。在未来究竟如何，对于处身当代的西方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只是在近二百年遭受西方文明碰撞的中华文明来说，现代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来得过于匆忙，其所裹挟着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为时过早。虽然我们不能说当今的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隔绝甚远，我们的生活形态中，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科技等诸多方面，也都与西方当今社会共时性地分享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有些还非常的迫切与尖锐。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共时性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化约或者消除我们这个文明所面临的历时性的问题，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还有待一个历史性的文明逻辑来展示演变丰富甚至给予创造性的转化。也就是说，对于仅仅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历史来说，现代性问题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果真是像当今西方的现代性问题那样，这确实是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我在那本小册子和一系列著作中所一再指出的也正是这一点。那就是尽管我们确实是与当今世界一起面临这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但是我们还面临这更为严峻的历时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近二百年的历史向我们呈现的问题，我们到目前来说，也还没有真正加以解决，甚至我们也无法从与西方所共同面临的那些一系列共时性的问题中直接地由此解决我们的历史问题。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共时性问题，一个是历时性问题。这两个层面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我也反对那种只是用历时性问题而排斥共时性问题的观点，反对那种片面的“补课论”。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即便是我们处理好了历时性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解决当今的现代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清醒地面对或者寻求历史的问题发生机制，真实地处理中华民族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来应对当今所面临的共同性。

### 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社会建设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它所具有的启发性是有限的，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待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所谓当今中国思想领域中的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对立，但其理论上是共通的思考。对此，我都是持有异议的。

第一种思考或理论形态，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西方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忽视西方现代性历史的历史演变过程，把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单

纯的一般问题，直接照搬到中国，并且把相关的问题视为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并以此为尺度，来勾勒、塑造和激发中国现代的思想，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完全的模型塑造来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其实这种理论设想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并不是已有的这样一个完整形态。在西方关于古今之变，关于现代性的历史生成，除了具有不同的理论路径，有着左中右种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也还有着一个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发生学。有一个现代性问题的早期与晚期之理论的不同。我将指出，早期现代的问题与20世纪的现代性问题是有着重大不同，甚至是根本性分歧的。也就是说，20世纪所谓现代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背离了早期现代的基本精神。人类社会在西方的演变到20世纪，在20世纪的西方作家那里，已经呈现出了破碎而荒唐的景观。因此，以20世纪西方现代性为轴心的现代性问题，不过只是一个版本，并没有穷尽西方思想富有生机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所虚心接受或马首是瞻的这种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值得探讨和质疑的。

第二个方面是，对于这种现代性理论的中国版本，它也完全忽视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语境、社会基础以及近百年来的社会形态、文明转变的模式等一些核心要素。即便中国存在着一个现代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缘起和存在，也只有一百五十多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历史的演变，也可以说大致走完了西方五百年的历程，经历了西方五百年的发展周期。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现代性，是不可能重复或重演西方五百年的历史的，也是不可能在逻辑上对应的完成五百年历史的逻辑要素的。其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像西方五百年的历史那样，有所完成。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完全迥异于西方现代性历史的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它到今天所面临的自身问题，与五百年的西方文明所面对的自身问题是有重大的历时性差异的。因此，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是在逻辑上共融的，在历史阶段上也是不同的。因此，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第二个缺陷，就在于他们忽视了中国一百年现代性问题的发生学所包含的真实内容。因此在忽视或片面理解西方现代性五百年的发生学和中国现代性一百多年的发生学这两个问题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在中国思想界粉墨登场的所谓现代性问题，也就显得缺乏基础，空洞无物，因此，这样一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与中国自身的问题，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都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关系。

第二种思考或理论形态，是另外一种关于中国的想象，即所谓的“抽象中国性”问题。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潜伏着一种在我看来属于“怨恨”的思想意识，就其学术语言来说，它是以一种反西方，尤其是反英美的“中国主体性”为理论标识的思想意识，或强调“中国特殊论”的一种关于中国自己本身的文明叙述或理论。这种理论，说起来是与现代性问题有关的，或者在我看来，它是前述的现代性问题的另外一个翻版而已。看上去它似乎是在强调甚至高扬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的独特性，它以拒斥西方现代性为坐标，其实它的底色是与西方现代性问题相关的，甚至是共享着共同的理论基础的，只不过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以一种拒绝的面目而出现的。

这种思想理论在它拒绝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其实是与西方的现代性共享着同样的理论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堂堂正正的理论，如果它是生发于自己的文明主体，它应该是拥有着一种开放的心态，拥有一种面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境况，而向过去、向当今甚至向未来展开的一种宽容与接受的姿态。而当今中国的独特论或主体论，其实是不具备这样一种开放理性与和平的心态的。我把它们视为一种怨恨，是有所指的。这样一种以拒斥和否定西方的文明模式为前提的中国主体论，在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一种主体理论，因为任何一种主体理论都是源于自身的，源于自己的历史过程、生活方式，以及它所面临的攸关问题而寻求解决的一种理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其得失暂且不论，就中国晚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被裹挟到了一个以西方为主导，尤其是以英美为主导的人类历史的现代性进程当中。那么，要寻求中华民族自身的主体意识，构建自己的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看似异质的文明，不得不面对与这个文明碰撞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中西文明的对接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漠视甚至敌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鸵鸟式的构建自己的所谓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寻求自己的所谓主体性，这是一种理论的短视和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

尽管这样的一种理论是可以同情的，甚至也有着现实与历史的语境，可以说，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备受西方列强的欺辱，遭受西方文明的打压，甚至被动改造自己的国民性，重塑中国文明形态的历史，其中所饱受的屈辱，也是历历在目。但是理论应该有一种超越苦难的力量，应该能够超出有限的实践，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中华民族的命运，乃至看待人类历史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那种复古的古典主义，那种企图把王朝政治的一系列礼仪制度、文化精神乃至人性理想在当今重新复活的主张，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这样的一种进程，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死守传统显然是不行的。所谓真正的传统，乃是活的传统，是一个历史中的那种能够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生命力的精神的重生。而且，这样的一种活的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来说，它必须积极性地应对中西文明的冲突问题，必须应对西方现代性问题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新课题。当然正像前面所说，西方现代性有其教条的一面，它所提出的问题，对当今中国来说，有些是虚假的。但首先也应该看到，这种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而且是富有重大挑战意义的。即便是那些所谓现代性的伪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真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现代性问题的真与伪，是需要用时间来加以穿透的。他们可以通过一种转换变成我们的真问题。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百年的碰撞所呈现的问题，不但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是中国人在现代社会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态、政治制度和人性理想的过程中所无法摆脱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给予吸纳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因此，如果对这些问题简单排斥或否定，而去固守中国的本土性，以所谓的“中国主体性”来消解西方性，消解人类在当今世界所普遍面临的由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普世性问题，那么

所谓的中国主体性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要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相当空泛，甚至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作为一种文明和作为一个人来说，它除了具有着自己摆脱不了的中国文明这样一个历史的担当之外，它还应该有勇气和能力来去分享作为现代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文明的责任。

#### 四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谈另外一层问题，即文明竞争问题。在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一种文明的冲突，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生活方式之文明性的优劣之别，那么作为仅仅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历史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来说，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就有着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现代历史中，中国还是一个后发国家，尽管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在后发的现代化历程中，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重新塑造自己的现代历史，塑造现代的人格。如何塑造？这里就面临着一个学习与驯化的问题。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承认，文明是有着一种领导者的机缘在里头。文明的竞争，是一种能力和优良素质的竞争。在此，作为后发的中国现代文明和现代中国人，我们应该去学习或者塑造一种卓越的能力，而不是去比拼独特性的能力。可以说，任何一种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存在过的文明，都不乏自己的特质，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有一个文明的卓越成长的过程。很多其他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灰飞烟灭了，只有卓越的文明才会存续下来，有所贡献，并绽放出灿烂光辉，它能够领导人类迈向一个更高境界。

我并不是说现代的欧洲文明或英美文明就是最高文明，我不否认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其他同样优秀的文明，中华民族同样有这种辉煌。但是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的竞争，就像是拳击场上的较量，我们应该去追求一种卓越。而在当今世界，这种卓越已经事实上体现在了英美或欧洲文明之中。学习这样一种卓越，并不等于放弃自我，“化我为他”，而是应该是化敌为友，“化他为我”，加上我们自己传承的五千年的文明，从而真正塑造出我们自己的卓越性。那种主张比附拉美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其他文明的那种中国独特论，实在是妇人之见，或庸人的俗见。实际上，在西方的古典思想中，亚里士多德的德行论，格劳秀斯的文明论，尤其是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思想，都有非常丰富的论述。当时的思想家之所以在那一时代，对他们所处的文明提出一种创造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有能力、魄力来提出一种追求民族精神之卓越的创造性思想，从而使我们看到作为这种思想之载体的文明在当时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回到中国问题上来，我认为真正的中国主体性思想，不是割裂古典思想，更不是排斥西方思想，而是能够有能力把古典思想和西方思想融和到现代中国的理论叙事当中，培育这个时代中国自己的卓越精神，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历史大国的理论寄托之所在。

总之，前面我从两个层面论述了那种所谓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片面性和现代中国性的片面性，而企图在这两个思想之外寻求关于中国现代性之“活的思想”，这样一种活的现代性、活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在我看来无论是西方当今的现代性理论，还是中国当今的独特性理论，都难以给出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其实，这种思想的懒惰，或思想的盲点，并

不在于在人类的思想理论层面上存在着空白，而是在于我们应该重新回到人类思想的本源，去发现问题的实质，发现真正富有教益的思想的源流。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理性应对当今东西方思想理论界喧嚣一时的现代性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对此加以沉迷或抛弃，而是要寻求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在我看来，关注早期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能够揭开前面我所指出的这两重片面性的思想之窠臼。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回到了格劳秀斯。那么，为什么我要研究格劳秀斯以及相关联的17世纪欧洲思想问题，这里是有着一个理论的背景的，那就是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或失望。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困惑，是因为关于现代性问题，理论界存在一个盲点，即把现代性问题一股脑看成当今20世纪盛行的问题，并以这些20世纪思想家的言辞作为理论的标示。其实，即便是在西方，也远不是如此。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也并非是西方现代问题，至少不是“早期现代”问题的唯一逻辑归宿。那么“早期现代”在西方的理论谱系中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对于西方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以及西方的现代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发生了何种畸变，思考这些问题就使我们抛开那些当今现代性问题的一些显学、大师所编制的重重迷雾，而回到早期现代的思想语境之中，去看看在那个充满思想张力与原创性的两百年间，当时的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看待人性历史与未来等诸多根本性问题的。从这样一个早期现代的层面上，我们再回到中国当今的思想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如果要找一个思想理论的相关对应的话，那么与其说是与西方五百年的历史相对应，不如说是与早期西方现代相对应更为恰切，它们对我们思考中国当今问题更有启发参考意义。当然这种对应只是一个笼统说法，并不等于完全一致，但它可以提出一种思考的维度，或使我们走出歧路的路标，由此提醒我们如何审视我们所处身的中国现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当然，对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中国的思想家们自己。

关于早期现代问题，我将从几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并由此而导向一个中心问题——格劳秀斯传统。在我看来，格劳秀斯的思想只有在早期现代这样的一个背景中，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展示。或者说，格劳秀斯的思想是早期现代问题中的一个核心思想，通过研究格劳秀斯，那么，我们才会对早期现代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并以此来看待前面我所说的现代性问题。

## 五

早期现代与现代化和现代性之关系。我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曾经一再指出，现代性问题并不等同现代化问题。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也具有很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一般说来，现代化是一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术语，它揭示的是西方自中世纪以来，尤其是民族国家的体系建立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一种制度性的生长发育与演变过程。这其中，现代科技发展、经济社会结构、政法制度乃至文明形态，都出现了与古典时代甚至是中世纪时代所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甚至是个人存在的样态。这其中，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法治宪政民主制度

的完善以及国际法所塑造的世界格局的确立等方面，是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基本的框架。而在其中，个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个体权利的保障，公共社会的开放，私人自治的自足，以及文化与精神的自主性，国民财富的增长，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基本成果。也就是说，从社会制度层面和个体生活层面两个方面，现代化所意味的，是一个现代社会全面丰富和发展的一种历史进程。它包含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层次的展开，包含着个体自由与法治社会两个维度的消长，包含着现代国际秩序与民族国家相互关系的丰富等几个方面。

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有别于古典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高新科技的兴起和全球化的进程，这种现代化的过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或者说，原先意义的现代化，在西方已经完成，而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或者后现代化时代。当然，关于现代化的标准以及西方世界在20世纪下半夜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是否意味着现代化已经完成，是否意味着一个不同于现代化的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及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虚拟时代等等，是否已经不属于现代化的进程，在西方也还有诸多争论，甚至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怎么说，发轫于15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进程，其中的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演变，确实是在当今世界中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人类在20世纪，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么西方当今思想理论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以及当今社会所处在一个新的转型这些问题，都摆到了桌面上。由此对于所谓的现代化，给予一种新的反省。但是究竟这样一个新时代是不是反现代化的，是不是可以被容纳到现代化的一种新形式，都无定论。

总的来说，五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在当今的西方已经在制度和物质生活层面上固化了。至于未来的世界究竟向哪个方面演变，以及对于人的生存处境、人的精神和人性，以及生活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就作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所谓现代性问题也就出现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我看来，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性问题与现代化相共生，它是西方现代化的五百年进程中达到它的接近终结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反思性的，甚至是批判性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说，没有现代化的文明进程，没有现代化这样一种五百年来的制度与物质、制度与文化的进程，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上述三个层面在它的终结之时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就这个意义来说，现代性与现代化相共生。但是现代性又不同于现代化问题，它是一种反思、批判乃至否定现代化的文明逻辑而出现的思想理论。这个理论也同样触及到物质生产方面、政法制度方面和精神文化方面三个层次，也就是说现代性问题从上述三个层面对于西方已经走过的现代化过程给予了富有冲击性的反省，并由此导致出对于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的颠覆性认识。因此，现代性又是与现代化截然对立的一种理论。

当然我们看到，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其富有张力的探讨往往是把现代性的问题追溯到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像一些著名思想家所提出的现代性的三波潮流。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语境下的对于现代化早期思想的反思，并不是一种客观历史逻辑的反思，而是一种基于当今现代性的背景下对于早期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些思想家笔下的那些早期

现代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及其文本，已经脱离了早期现代的那个客观时代，而是被只放到现代性当今的语境之下来解读而已。它们与真正的早期现代是无关的。

因此，在这里就如何看待早期现代，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同层面和视角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重视角，即在现代性问题包裹之下的早期现代问题。我们知道，当今现代性的一些主流思想家都很重视现代性思想的源头，重视 15 到 17 世纪这一时间段中的西方经典思想家的作品，也都纷纷把解读这些作品视为他们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关键点和核心点所在。但是应该指出，这些思想家们的理论实际上存在一个前提性的预设，那就是他们对于现代性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之后，由此来反推早期思想家们的作品，从中梳理出一种从早期思想家到现代性演变的内在逻辑，并由此证成现代性的一些核心问题不过是早期思想家们的诸多理论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他们的滥觞而已。例如，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等人所作的对于诸多思想家们经典解读，实际上隐含着就是这样一种倒推的理论逻辑。他们关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的认识，关于现代性的三波潮流的认识，所依据的不过是现代性的既有结论，并由此挖掘早期思想家们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并进而质疑甚至否定整个现代化五百年的历史本身。

我在自己的小册子及相关论著中，对于他们的这种解读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尤其是对早期思想家的理解，是有很大片面性与先入之见的。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五百年来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正面历史，不愿意看到早期现代思想所可能开辟的多种思想路径的可能性，而仅仅以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现代性的既有现状，由此反推早期现代思想。他们这样做，实际上这也就整个颠覆了西方文明进程中的正常历史演变的逻辑，否定了五百年的历史成果。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这五百年，完全是一种礼赞和接受的态度。我也承认这五百年来，甚至到今天这样一种地步，其中有诸多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但是这五百年来，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无论是科技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五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人。我们思考任何问题，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现代文明成果与现代现代人的基点之上。另外，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来，应该在这样一种现代的既有基础上，重新寻找新的前景，也就是说，对于五百年生成演化的现代文明，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其已经病入膏肓，或许它可能是遍体鳞伤，但绝不是奄奄一息。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之下，我在小册子中曾经主张用英美经验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将它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经验问题，不去探究古今裂变的起点，也不去探讨其终结点，既抛弃那种关于现代化的盲目乐观，也抛弃那种极端悲观和末世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理性或本性去把握所谓的前生末世，人所把握的只能是经验。我们也许并不是非要回答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性的问题，而是应对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有限的历史主义，改良的经验主义，这也许是英美思想的智慧。

回到早期现代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早期现代的另外一种研究或分析的切入点或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对于早期现代的研究，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放到现代性的终极关切之中，而